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王为政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王为政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1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听画	(1)
魔道	(211)

听

画



天庐居士

一九九一年五月，新加坡。

“新加坡人不是用眼睛看画，而是用耳朵听画。”

我刚到新加坡不久，便听到这样的惊人之语。在国内只听说有腋下认字、耳朵认字，而未闻有以耳朵“听画”者。莫非新加坡人个个有“特异功能”？

据说，出此惊人之语者，是一位号“天庐居士”的老先生。他是本地著名的收藏家，家藏中国书画珍品无数，但性情孤傲，有来访者，若话不投机，往往被讥为“孤陋寡闻”、“俗不可耐”，受其冷遇。“天庐居士”嘛，地上住不下他，便以天为庐，凡人自然不在他的眼里。因而，许多人对他的“天庐”望而却步，那里到底藏了些什么，也不甚了然。这倒愈加引起了我去造访的兴趣。我想，孤傲的人必有值得一傲的资本。

我拨通了天庐居士府上的电话号码——这是很容易查到的。接电话的就是他本人。一个虚弱的老人的声音，普通话讲得很好，几乎不带南洋口音。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他听了并未显出什么孤傲，表示欢迎，



王为政卷

还说了“久仰”、“如蒙光临，不胜荣幸”之类的客气话，也不知是否出于真诚。但他详细地告诉了我他府上的地址，约了见面时间，又不象是违心的。也许由于我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中国人，并且是画家，况且还是画中国画的画家之故。

黄昏时分，我吃过了晚饭，如约前往。南洋的夏天很长，晚上七点多钟，天还是大亮的。其实南洋永远是夏天，只不过夏天更“夏天”罢了。我雇了一辆计程车，径往天庐居士府上——“查无是路”某号。这个路名很像是我虚构的，其实不然，是按英文路名 Jervois Road 音译的，“查无是路”有路可查。

天庐居士的府上是一座独立式住宅。矮矮的透花栅栏院墙爬满了青藤，人站在外边，目光越过院墙，院中景色一览无余：一幢二层小楼，白墙红瓦，券门，象放大的童话中的小房子；房前，白色的、紫色的叶子花（南洋叫“九重格”）和七彩斑斓的新加坡国花卓锦万代兰开得灿烂一片；花丛中，竖起几株高大的棕榈树和那种叶片排成美丽的扇形的、犹如孔雀开屏的南洋芭蕉；树下是茵茵草坪，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从房门通至院门。

院门是锁着的。新加坡没有“夜不闭户”这一说，就是在大白天，也是家家门户森严，铁栅门上挂着沉甸甸



甸的大锁，客人来了，主人便从腰间掏出钥匙，唏哩哗啦地开锁迎客，客人的自我感觉象是“探监”。其实新加坡的治安良好，鲜有入户抢劫之徒，不知为什么人们却总是如此倍加防范。不过象天庐居士这样的大收藏家，铁将军把门倒也在情理之中。

我来到门前，伸手刚要按门铃，忽地一串犬吠声不知从哪个角落窜了过来。低头一看，却是一只玩具般的卷毛小哈叭狗，大耳短鼻，吐着小红舌头，朝我狂吼不止，却毫无威慑力量，只显得滑稽可爱。随着它的吼声，便有一个中年女人跑出来开门，狗的叫声代替了门铃。

这女人肤色很重，厚嘴唇，看样子是个在南洋常见的泰国女佣。我说的话她听不懂，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不过她似乎不是向我询问什么，只不过用我听不懂的话打个招呼而已，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开了门。显然这里平时门可罗雀，今天因为天庐居士事先有所交待，此时客至，女佣便知必是我来了。我进了门，那狗还在“汪汪”地发威。泰国女佣斥了它一声，狂吠戛然而止，哈叭狗吐着小红舌头，舔我的皮鞋，摇尾乞怜，亲热得了不得。狗就是这样人云亦云，毫无主见。

泰国女佣和狗带着我来到房门前。上了三层台阶，泰国女佣就把鞋子脱掉，看来我也该脱鞋了。按照新加



王为政卷

坡人的习惯，进门必先脱鞋，然后赤脚大仙般地登堂入室。偏偏我极不愿这样“入乡随俗”，正在犹豫，里面传出了天庐居士的声音：“王先生不必脱鞋，请进！”这破例的通融使我对天庐居士未曾见面便印象颇佳。

走进客厅，迎面便看到墙上的一块雕漆横匾和一副对联。匾文是：“以天为庐”。正是我所猜想的他号“天庐”之意，可见口气之大；联语曰：“移柳待月对竹思鹤，按图索骥误笔成蝇。”集句集得巧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文人雅士兼收藏家的自得其乐之趣。这时却不见天庐居士其人，左面一道屏风把客厅隔成两部分，屏风后面传来电视的声响。我听得出，现在播放的是每天一集的电视连续剧《我爱芳邻》，本地著名歌星黄文永正在唱主题歌：

你的名字我不知道
我的年龄也从未向你透露；
你我同在一个屋檐下，
彼此陌生却又朝夕相处；
昨日东家长来西家短，
今天却各自修行各走各路……

我有些不悦。你既然约我前来，不该这么慢客。我



已经到了，你不出来，还在看电视！

就在这时，我已经从屏风旁边看见了天庐居士。他深深地陷进沙发里，显得那么瘦小。听到我的脚步声，他这才撑着沙发扶手，拄着手杖站起身来。

这是一位相当瘦弱的老人，简直可以说是皮包骨。穿着一身米黄色绉纱裤褂，象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衣裳架子。脚穿青布鞋，他原来也是不脱鞋的。头顶几乎不见头发，颞下倒有一部浓密的银须。因为瘦，颧骨和眉弓显得特别高，一双眼睛却黯淡无神。他撑着手杖，摸摸索索地向我走来：“是王先生？请坐，请坐！”刹时，我在心里原谅了他的“慢客”，原来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

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落座，说：“对不起，打扰了您看电视……”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他……他是个盲人！

天庐居士苦笑了笑，细声细语地说：“我有眼无珠，哪里是在看？是在听！其实这种俗不可耐的戏也不值一听，我是在等八点新闻！”说着，用手边的遥控器把电视的音量减得很低，却没舍得关上。他吩咐泰国女佣为我泡茶。他说的话我听不懂，只是凭他的语气和泰国女佣的反应猜出他说的是泡茶。他为此向我道歉：“对不起，我是不得已才当着客人的面讲方言！因为中国话里



王为政卷

她只懂福建话。”

“您不必这么客气”，我说，“天庐居士是福建人？”

“不，福建话是来新加坡之后学的。”他笑笑，“其实，敝乡南京。听说先生的府上也是江苏，那么，我们还是大同乡了！”

“是啊，有幸和居士是大同乡，他乡遇‘故人’了！”我不无感动地说，因为我不曾事先提到自己的籍贯，天庐居士竟了如指掌，表现了作为中国画收藏家的素质，显然“久仰”之类也就不是虚伪的应酬。但我不好就此表示什么，只说：“您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啊！”

他又笑笑：“南腔北调罢了！大半辈子四海为家……”说到这里，我以为他要谈自己的传奇经历了。他却停了停，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中国人，还是要有一种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新加坡的华人，福建的、广东的……各讲方言，彼此隔膜。现在政府提倡华人讲华语——就是大陆所说的普通话，这是很有远见的。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五千年而不衰，独特的语言文字是极其重要的传播工具。据专家预测，二十一世纪将是华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到那时候，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又将大大提高了！”确切地说，天庐居士只是“华人”而不是“中国人”（尽管在英语中这二者是一回事），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仍对中国怀有如此深情，



实在令人感动。

我喝着他那浓酽的“铁观音”，不由地说：“您致力于中国书画珍品的搜集、收藏，对于中华文化的流传，也功德无量啊！”

天庐居士却淡然一笑：“先生过奖了。我是因爱画而藏画，碰巧有益于世，不谋而合罢了，何谈功德？不过，若为功德而藏画，则更无功德可言了！”

象是自谦，却又含着高度自信。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天庐居士的艺术观、功德观，于淡中蕴浓、平中寓奇。

刚刚谈到有关收藏家的正题，天庐居士却突然打住，眼睛“望”着电视。《我爱芳邻》终于播完了，屏幕上的“莱蒙威”表正指在八点。

“对不起”，天庐居士歉意地然而又是不可通融地对我说，“我不能看报，每天的新闻却不可不听……”

“我也是这样。”我赶忙说。其实这话说错了大半，我不但每天必看（而不只是“听”）电视新闻，而且必看报纸，并不象他那样双目失明。不过他倒没在意。

现在，播音员胡敬中和曾月丽开始报告新闻，新加坡人熟悉他们就如同中国人熟悉赵忠祥和邢质彬，连模样都有些象。

天庐居士听完提要就把电视关上了。“没有关于艺



王为政卷

术的新闻，不必听了。我们谈我们的。”

这位老先生心中只有艺术，“听”电视也只听艺术。我突然想起他的那句惊人之语，脱口说：“据闻，您说过：新加坡人不是用眼睛看画，而是用耳朵听画……”话说到这里又后悔了，他……他是个盲人哪！

他却坦然地笑笑：“岂只在新加坡？全世界都是如此！”

“唔？”我不解，他的惊人之语又升级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把话题扯得很远：“先生是画家，一定很熟悉国际艺术品市场的行情。现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位画家能比荷兰的梵·高更走红。最近——五月十五号，他的《加赛医生肖像》在纽约被日本大昭和制纸公司会长斋藤了英以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惊人高价买去，继他的《向日葵》、《鸢尾花》之后，再次创‘世界纪录’。可是，先生知道，他生前穷困潦倒，平生只卖出一幅画《红葡萄园》，售价四百法郎，而《鸢尾花》则无人问津。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七年，这幅画曾先后被纽约的三家画廊收藏，价格也并不高。一九四七年，查尔斯·佩森女士以八万美元把它买下，创了当时的“纪录”。四十年后，一九八七年，佩森家族把这幅画拿到索思比拍卖，澳大利亚富豪艾伦·邦德出价五千三百九十万美元而成交，价格已是四十年前的



七百倍！死后百年的梵·高为天下瞩目、世人景仰，他的作品被视为人类至宝。请问：一百年前人们没长眼睛吗？今天又凭借什么发现了这些画的‘价值’？是用眼睛吗？”

天庐居士说话的声音不高，但语气极其严厉。高高的眉弓下，那双深陷的眼睛专注地盯着我，盯着全世界。而那双眼睛却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真的什么也看不见吗？……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日，一个令艺术之神感到骄傲或者沮丧的日子。

英国伦敦城金色的黄昏，位于市中心的克里斯蒂拍卖行门前车水马龙，一场震惊世界的艺术品拍卖即将举行。

拍卖厅里已经座无虚席，坐满了绅士淑女、社会名流，也不乏斗鸡走狗之徒，座位都是早已预订的。而最为引人注目并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些巨贾富豪。当然也有几位艺术家掺杂其中，但他们没有往日在自己的画室里或展览会上那么自信、自若，而是有些惶惶然。因为，待一会儿，艺术家们视为生命和儿女的作品将象鱼和肉那样摆上来示众，待价而沽。这里不是艺术圣殿，而只是市场。他们以无法掩饰的羞怯和恐惧神色窥测着



王为政卷

周围，等待着即将遭受的精神折磨。哪位艺术家敢于亲自观看自己的作品拍卖？今天光临的都是事先打听清楚拍卖与自己无关才惴惴驾到的。实际上不可能“无关”，他们很关心自己的前辈或同行的“行情”，这种关心，既有因被“卖”而感到的耻辱，又有某种企盼。

大厅里，十几位拍卖行的职员坐在一侧，每人守着一部电话机。而在人们所不知道的某个地方，电话线连接着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前来或不愿露面的买主。他们腰缠万贯，遥控着这间大厅。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在人们心头。

主持人登场了，拍卖开始。每一幅画出现在拍卖台上，他便首先报出底价。于是有人举手加价，进行一场财力的较量，富有而又挥金如土者胜。那些手持电话听筒的职员，此时紧张地传递信息，听取指令，代主报价，卖力地作“传声筒”。

突然，像有一团金光照亮了大厅，人们立即鸦雀无声。拍卖台上开放了一束金色的向日葵，那是梵·高的《向日葵》！

荷兰画家文森特·梵·高，一生画过七幅《向日葵》。作于一八八八年的有四幅：一幅由日本商人收藏，后来毁于战火；另外三幅收藏在欧洲古董商手里。作于一八八九年的有三幅：一幅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一幅



收藏在费城博物馆；最后一幅，现在正摆在拍卖台上，而它的来历却鲜为人知，据说是从梵·高家族后人转入商人之手，最终又出现在这里。

十五朵黄色的花朵，黄色的花瓶，黄色的桌子，一切都是灿烂的黄色。《向日葵》默默地开放，它在等待“买主”吗？

主持人报价：“五百万英镑！”

台下立即层层加码：

“五百五十万！”

“六百万！”

.....

“一千万！”

“一千五百万！”

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向日葵》已经使人们发了疯！无论是主持人、监场的或者充当“传声筒”的职员、狂热的竞争者，还是普通看客，都屏住了呼吸，大厅里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到千钧一发！

“两千万！”

“两千二百万！”

场面静下来了，静得可以听到人们的呼吸和心跳。可怕的沉默。在金钱面前，人们分出了高下，捉襟见肘者终于没有力量和勇气再攀登了，还有谁？有谁能登上



王为政卷

这金字塔的顶峰？

有的，也许会有有的。如果没有，现在便已经是顶峰，《向日葵》有主了！但是，且慢……

这时，一位紧握着电话听筒的“传声筒”猛地跳起来，用沙哑的嗓子喊出最强音：“两千二百五十万！”

死一般的寂静。人们被吓傻了！

主持人缓缓地举起木槌，目光像搜寻猎物似地巡视着大厅：“两千二百五十万！……”

没有人再满足他那更贪婪的期待，谁也不敢搔首挖耳擦鼻子，以免被误认为举手。

主持人于是高声说：“两千二百五十万，以最后一次报价敲定！”

“当”地一声，木槌落了下来，截止到此刻，世界上最高的画价诞生了。光荣属于文森特·梵·高吗？不幸的文森特活着的时候曾经壮起胆子说过：“我敢向你担保，我所画的《向日葵》对于那些苏格兰或者美国的收藏家来说，每幅也将值五百法郎……”而今天《向日葵》换来的钞票是两千二百五十万英镑，相当于两亿二千八百万法郎！

大厅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默默地从头到尾听着这一切。这是他今生最后一次出席拍卖现场，以后就再也没去过。但是他毕竟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在他无



法与世隔绝的“天庐”之中，还在关切而又焦虑地听着外界的声息……

“我不买西洋画，但并不无视它们，了解世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天庐居士现在说起来仍然很激动，“随着西方艺术品的行情疯涨，中国画也开始走俏。在去年三月的太古佳士得春季拍卖会上，清末赵之谦的《花卉四轴》以三百五十二万港币成交，创了近代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去年十一月，索思比在香港将张大千的晚年泼墨山水《松壑飞泉图》以二百九十七万港币卖出，为当代中国画家作品售价之最；去年五月，吴冠中的《高昌遗址》在香港索思比以一百八十七万港币出手，在世的中国画家目前尚无人能出其右。对此，真正的行家，堪喜，还是堪忧？”

天庐居士再次推出一个问号，话却停了。那双视而不见的眼睛盯着我，显然在等着我回答。

我当然要回答。

“我算不算‘真正的行家’，姑且不论。但我可以谈谈自己的感受：喜忧参半。”

“所喜者何？”他好像在审问我。

“喜者，”我说，“尽管这些中国画的售价比起梵·高或者毕加索还微乎其微，但毕竟标志着中国画终于打进